

社会共生

郑惠芳

联合早报, 2012年2月5日

一年前到台北旅行，对那里的捷运系统留下很好的印象。从基本的信息如地铁通往哪里、几点到站、现在几点，到把厕所设在站内靠闸门处、附育婴室等，处处显示以客为尊的态度。因带着年幼女儿，必定有人让位，有时是两三人同时站起来，让人觉得窝心。当时忍不住做比较：在新加坡，一些地铁站是不设时钟的；转换地铁时，列车到站时间的提示牌隔老远才有一个；在车厢内，要是分神或因为环境太吵错过了广播，而自己刚好身处“错位”车厢，就会不知身在何处；要是哪天闹肚子那就更糟了，虽说几乎每个车站都设有厕所，但许多都不设在显眼处，有些还离闸门甚远，寻寻觅觅一来一回，真的急得人屁滚尿流！纳闷的是为何我们的设施，往往硬件都在，软件缺缺。友人认为，台湾民众力量大，商团政府都得照顾各方民意，再者中年以上的台湾人从小就接受“爱的教育”，因此社会秩序、人文素养都不同。

重提旧事，不是想回应近期的地铁故障，而是出席了政策研究院的常年旗舰会议“2012年新加坡透视论坛”有感而发。

会上讨论社会不平等与社会流动性的问题，主题是如何让全民融入，与新加坡共生（Singapore Inclusive）。在回答与会者提问时，一名主讲者建议大家尝试在探讨问题时，撇开“政府”不提，好好地想想人民如何动员资源、组织力量，在政策的制定方面更积极投入、争取，以智慧和公民觉醒提出具建设性意见。

台湾的捷运业者能够在设计及建设捷运系统时处处设想周到（至少在我到过的数个地铁站），如果台湾人民的力量真是促成因素之一，那的确有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。新加坡人仰赖政府解决问题已成习惯，政府领导民众接纳硬政策也经验累累，然而，社会不断转型，世界逐渐缩小，要如何以新的模式思考解决社会种种问题？复旦大学教授胡守钧倡导的社会共生论，或许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些思考空间。

胡教授提出的“社会共生论”，讲的是政与民，民与民，乃至人与人之间互赖生存，共拥成长，摒除强弱对立，二元分化，像小草靠树荫挡风，大树赖丛草扎根。建构共生生态需要坚厚的社会诚信为基础，尽量减低人与人之间的利害冲突，设法增强互补互利的条件。新加坡社会经过数度转型，已形成社会基本道德观念模式，现在普遍关心的诚信问题不再是官吏贪赃枉法，或民众矢的闹事。目前舆论最多，也在会上提出讨论的是在权者所需负起的问责与评估准绳，以及民众意见与反馈的渠道与素质。因此，民众要如何纠集力量，阐明立场又不树立敌对姿态，探试的是民众与政府的成熟度。前者够不够成熟理智，后者又能不能大方掌握契机。

社会共生，除了增加政民之间的诚信之外，另一基本诉求，是扩大社会建设的参与，增强国民的归属感。新加坡贫富悬殊的问题由几位主讲者轮番提出，我们真的能以四大支柱：教育、住屋、医药改革和就业奖励制（workfare）往上拉平（upward leveling）收入和生活素质差距吗？欧盟国家和澳洲提出的社会共生概念，跳出讨论“贫穷（poverty）”的困境，而是构想一个理想社会，然后策划如何确保全民全程参与。理由是，如果一个人为了脱贫每天得打几份工，那他何来时间和精力跟家人、朋友建立良好关系，更别说参与社区或休闲活动了。长此下来，他与他所处的社会必产生隔阂，在感情上和行动上都觉得与主流社会的社交与经济生活格格不入，何来共生？

同样的，以我国教育为例，一些学校决策层着重希望与质优生共生，以成绩优劣隔离学生“因材施教”，学生与师生之间的关系排比变得数据化，形成的观念是成绩差的学生必定较懒惰、不聪明、学习能力差等，而相对忽视了家庭背景、生活条件、学习机会与语言利益皆不均等的现实。因此，社会共生的终极目标，是要确保所有人都感觉受到尊重，并有平等的机会充分参与各方面的社区生活，着眼点不纯粹以个人成就来评估社会地位，而是更注重人与人、人与社会之间建立着怎样的关系。（作者是政策研究院研究员）